

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现代化意蕴

吴汉全, 汪益妃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1121)

摘要: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是一个持续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包括李大钊等在内的仁人志士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既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同时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社会变革方式。基于现代化理论来考察,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明示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和构建了领导主体,而且提出了“革命—现代化”的新路径,同时亦为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推动力量。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内蕴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底蕴,并有着极为深刻的现代化意蕴,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在五四时期由“被动”转为“主动”创造了思想条件。

关键词:李大钊;十月革命;现代化意蕴;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4)01-0001-10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4.01.001

The Modernization Significance of Li Dazhao's Publicizing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U Hanquan, WANG Yifei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wa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advancing social modernization, where the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including Li Dazhao mad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explore a path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opened up a socialist path of modernization on a global scale, breaking the monopoly of the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ing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Li Dazhao's publicizing the October Revolution not only highlighted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established a leading force, proposed a new path of “revolution-modernization”, and also clarified the driving for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 Dazhao's publicizing the October Revolution contains an extremely rich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modernization, creating the ideological conditions for China's shift from a “passive” to an “active” role in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ey Words: Li Dazhao;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modernization significan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2BDJ009)

作者简介:吴汉全(1964—),男,江苏大丰人,教授,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汪益妃(1997—),女,浙江金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就是不断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通过“革命—现代化”路径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体制、旧观念进而转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且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内蕴其中。当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轨道。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源来看,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倡导“以俄为师”,主张“革命—现代化”的新路径,就是认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通过社会革命的办法来推翻既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在完成反帝反封建目标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学术界对于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功绩有比较充分的研究,肯定了李大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地位及其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作用^①,但很少有文献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来解读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现代化意蕴。因此,本文拟应用现代化理论,重点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所关涉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领导主体、“革命—现代化”新路径、推动力量等要素,以阐释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所具有的现代化意蕴。

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明示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现代化是以其目标为前进方向的,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有不同的目标。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所经由的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思想现代化阶段,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图景的,目的是中国能与西方“并驾齐驱”。中华民国建立后,李大钊关注并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发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了资本

剥削、民族压迫、人民困苦等众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李大钊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使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坚定了“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方向。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目的在于通过“以俄为师”引入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即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上,现代化社会代表着工业化、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因此,说到底它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农业文明的现代工业文明。而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首先出现的现代化模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近代中国(“五四”以前),现代化一开始即所谓的“西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虽然在日本留学时受安部矶雄、河上肇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但还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来设计救国方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既有材料说明,李大钊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就已经对资本主义的弊病有所认识,开始对中国道路进行不懈的探索,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迅速作出反应,阐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特质及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他说:“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330}而且他认为这股“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资本主义必然失败。这实际上指明了中国社会变革“以俄为师”的努力方向。

^① 这样的文章很多,皆是基于革命话语来进行研究的,恕不一一列举。笔者以为,即使是在革命话语视域之中,亦可以基于文本理念来解读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这个重大历史事实。如果从文本的角度来研究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4篇文章(即《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及《新纪元》),便可将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努力看成一个新文本。这个新文本的核心观点有五:一是“革命”的十月革命;二是“庶民”的十月革命;三是“自由”的十月革命;四是“文化”的十月革命;五是“新纪元”的十月革命。参见吴汉全:《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文本解读》,载《理论视野》2011年第4期。

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对“一战”性质的分析,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对“一战”爆发的原因有所探讨,认为“一战”的爆发乃是由列强的贪欲所致。李大钊说:“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原。”^{[1]34} 这里,李大钊以“贪”与“惰”作为“一战”爆发的原因,固然是很不科学的,但对于揭示列强掠夺的本质、侵略的野心还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剖析“一战”爆发的原因,说明他已经具有阶级的观点和制度分析的视角。譬如,他从阶级关系分析,认为“一战”的结局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实际上有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比较的视角,并揭示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衍化逻辑。他说:“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1]358} 可见,在李大钊的认识视域中,资本家与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对抗关系。不难看出,李大钊此时虽然在分析世界格局的变动、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但实际上也是希望以此能够唤醒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又譬如,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业已涉及社会现代化的动力问题,并且认识到先进生产力才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而无产阶级乃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出现的。这实际上又预言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必然先要把阻碍现代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打破。他认为“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1]358-359}。李大钊明确指出,当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之后,

资本主义国家就“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1]358},这必然会导致世界上被殖民国家的增多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李大钊还指出,俄国革命正是为了遏制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实现“阶级翻转”,从而使“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1]358-359}。李大钊扛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号召中国的劳工阶级应该在“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那么“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1]376-377}。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域中分析世界格局的变动,并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来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同时亦期待中国劳动阶级的成长。这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力图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十月革命对李大钊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最突出的影响是李大钊接受了十月革命中社会革命的理念,在思想上彻底放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仅为中国探索“以俄为师”的道路,而且将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并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367}。为此,李大钊在其后的探索中,将宣传十月革命推进至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其最为突出的努力有二。其一,在中国率先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北京大学为阵地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精英群体。李大钊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生的希望,他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通过进步刊物不断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同时利用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政治学系教授的身份,在课堂上和社团活动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时代精英。其二,努力促成青年与劳工群众的联系,并以多种形式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五四运

动的发生,适应了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主义”指导的要求。事实也证实,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中国劳工运动和社会变革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将动员进步青年与发动广大群众统一起来,并将这些纳入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李大钊积极筹备北方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推动工会组织的建立,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青年人才,这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骨干力量和必要的组织准备,同时也为使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创造了条件。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领导主体

就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政治是政党主导下的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政党领导下的现代化。事实也是如此,伴随社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政党在其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主导作用,成为“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转换,为社会主义政党在中国的缘起提供了发展契机^[2]。中华民国建立后,李大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极度失望,促使他寻求新的社会现代化的政党力量。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对现代化政党有了新的认识,已经初步认识到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在此后积极促成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获得领导主体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现代化政党的领导,李大钊对此深信不疑。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李大钊对政党的作用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寻找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领导主体。民国初年的中国,形成了政党蜂起的局面,思想界、舆论界对于政党的看法亦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出现了反对政党的情绪。李大钊认为,不应该以“旧历史之眼光”而谈“党”色变,政党如果“用

之得当”的话,那么“国且赖以昌焉”^{[3]1-2}。由此可见,李大钊在早年的探索过程中,是坚决捍卫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李大钊也指出,民国初年的政党活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党私”问题。他批评民国初年政党之间“徒以君子小人,有如水火”,其表现是:“一方既以道义相号召,则嬖幸之流,恐不见容,遂而荧惑诽谤,以泄其私,举正人义士,排挤倾轧于无余。私心党见之足以祸国,诎以时之今古而殊耶?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3]2}李大钊以维护共和政体、实行责任内阁制、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为目标,对民国初年的政党提出要求,认为立宪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在于争政见而不是争意见,这实际上是想使中国的政党活动能够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有所作为,在推动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时(时间节点大致是1917年8月之前^[4]),李大钊是从完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出发的,他基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为中国的政党政治基础十分薄弱,而且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三支力量”^①都比较失望。这促使李大钊开始对社会现代化新的政党力量作进一步探讨,希望有“以中级社会为中枢”的“中心势力”出现^[5]。考察李大钊此时的思想状况可知,他说的这个“中心势力”虽然是“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但实际上乃是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一个崭新的思想变化,是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十月革命之前,李大钊对于中国的下层民众是高度重视的,认识到下层民众对于社会运行的基础性作用,并希望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启发农民的觉悟,但此时他还没有涉及中国的劳动阶级的政党问题;他在1914年至1917年间曾重点研究“一战”的进

① “三支力量”:一支是先以袁世凯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政治力量,一支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以及其后的研究系,一支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

展,尽管业已注意到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与“一战”的关系,但也没有具体地论及无产阶级政党问题,更没有将无产阶级政党与世界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依此可见,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之前,还没有将目光聚焦于无产阶级政党。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无产阶级政党的理念被包含其中。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系列文章中,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确认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革命对于俄国历史进程的转折性意义。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开头,李大钊就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1]329}这里,李大钊说布尔什维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很清楚地说明布尔什维克所创造的乃是全新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与之前的俄国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那么,在李大钊此时的认识视域中,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到底是怎样的政党呢?在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中,为了说明自己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看法,李大钊引用俄国著名女性革命家柯伦泰的观点,指出布尔什维克“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364}。李大钊这段关于布尔什维克的论述,至少说明了这样两点意思:(1)布尔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它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2)布尔什维克在性质上是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因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的社会党”,其目的在于“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364}。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研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不仅仅从俄国社会变革视角考察,更把布尔什维克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从而注意到布尔什维克在联合全世

界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的领导作用。在李大钊看来,布尔什维克在“一战”快要结束时所做之事,乃是“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反对资产阶级政府为了扩张生产力而发动侵略落后国家、落后民族的战争。因为“一战”爆发的“真因”乃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1]358}。故而,在李大钊此时的认识视域中,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消灭落后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李大钊通过十月革命的宣传而对无产阶级政党有了崭新的认识,这为他在中国致力于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启动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实现的。

李大钊通过宣传十月革命进而在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表达了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期待,并积极地致力于建党理论的探讨。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对于无产阶级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李大钊利用伦敦《泰晤士报》刊载威廉氏所写的通讯,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从影响力上看似乎“带些宗教的气质”,但马克思主义的愿景“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李大钊指出,威廉氏说一个铁路工人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至高理想抱有些怀疑的态度,但是这个工人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与“耶典”对人心的积极影响等同而论,这表现出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持有积极的态度^{[1]365}。故而,李大钊希望中国能够效仿十月革命,着手研究和推进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他在1921年3月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声明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化政党必须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和布尔什维克性质相同的“社会主义团

体”^{[6]350}。而且,李大钊在此文中还极力敦促中国的进步分子要赶快组织建立共产党,认为只有“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共产党,才能承担领导中国进行“彻底的大改革”的任务^{[6]350}。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的主张,可以看作是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书。此后,李大钊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在课堂、社团活动、社会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的现代化精英群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骨干力量。同时,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在北京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作好了组织准备。概而言之,李大钊在欢呼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倡导建立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为中国走“革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强而又可靠的领导力量。

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出“革命—现代化”的新路径

研究现代化必须注意革命的问题。这是因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7]91}。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手段才能“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8]。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时期是通过“革命—现代化”路径向前推进的,并且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指向社会主义方向的。李大钊通过十月革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内容和意义,并从十月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看到马克思主义一经与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相结合,就产生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话语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手段,可以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扫清障碍,并在社会革命中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李大钊才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极力主张中国通过“革命—现代化”路径进行反帝反

封建的民主革命,推进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同时致力于动员和组织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力量,努力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开辟新道路。

李大钊提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革命—现代化”路径,最早来源于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和总结。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李大钊把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比较,充分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所进行的社会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他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1]329}这个“文明”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个道路是通过“革命—现代化”路径推进的,并有着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的思想意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认同的俄国革命手段,其中蕴含了革命人道主义的色彩,而非那些拒绝革命者所描绘的血淋淋的恐怖和洪水猛兽,从而表现出他对社会革命这一变革手段的认可和追求^[9]。他说,十月革命亦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与伦比”^{[1]330}。在李大钊的认识视域中,俄国革命非但不会造成社会的恐慌,而且其所内蕴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还会经由十月革命传播到世界其他的国家,从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俄国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及其所彰显的世界意义,对于李大钊是一个有力的鼓舞。李大钊并由此对社会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社会发展手段的普遍性作出了大胆预测,进而阐明了社会革命手段在对抗资本主义而开拓 20 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中的特殊意义。1918 年 12 月初,李大钊就把“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还有“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的革命,视为“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并认为这些国家所发生的革命皆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他说,这些国家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是俄国革命

影响下的社会革命,亦即这些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的社会革命,具有思想意蕴上的同质性。而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李大钊认为是因为“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1]368}。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手段成为20世纪社会发展的新路径,固然体现出社会革命对现存不合理的旧秩序的破坏和对理想的新秩序的建构,更表现出社会革命有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而又广泛的参与,所以他把“一战”的结局解释为“庶民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尝试消灭剥削和压迫的不平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这对于近代中国处于艰难探索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引领和思想导向作用,这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目标发生转移,即由原来的传统西方(欧美)向新式西方(“新俄”)转移。李大钊把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实际上就是指明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积极地采取社会革命的手段。他说:“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1]377}李大钊提出的“新纪元”观点,所揭示的正是十月革命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实际上道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7]87}这说明,“世界历史”是一个总体性的背景,无产阶级得以产生并进行历史活动而推进世界历史的变迁,皆依存于这个背景。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突出“世界历史”这个总背景,并把中国的社会变革置于苏俄革命所开创的

“革命—现代化”的轨道之中,这是在“以俄为师”理念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革命化的实现路径。

李大钊关于“革命—现代化”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体现,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骨干。“直接行动”的理念在五四运动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充分运用,就是最为显著的表征。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不谈政治转向积极地参与政治,由对西方价值观的宣传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从而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进而引领了五四时期思想前进的方向。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历史性转折的进程中,中国发生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变为“主动”的转折点。早在发表《新纪元》等文章时,李大钊就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思想上的动员,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导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社会革命”的思想得到发展。在五四运动中,从刚开始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游行示威,再到后来工人阶级的直接加入,直接体现了李大钊提出的“直接行动”的理念。在1919年5月1日发表的《“五一节”(May Day)杂感》一文中,李大钊认为“五一节”是世界工人特殊的节日,这是“世界工人的惟一武器——‘直接行动’”^{[1]455}所造就的日子。这实际上明确了中国的社会革命就是要采取“直接行动”方式,亦即“通过广大民众参与的群众运动来实现斗争的目标”。李大钊提出的“革命—现代化”思想,也直接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青年骨干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譬如,1919年7月,青年毛泽东就指出,“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革命’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而对于“社会革命”这种社会变革形式,“我们应该起而仿效”^[10]。这里所说的“仿效”的对象就是俄国革命,“仿效”的方法就是苏

俄式的“革命—现代化”，亦即“以俄为师”。又譬如，邓中夏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之一，其革命思想受李大钊影响颇深。在李大钊影响下，邓中夏密切关注十月革命，集中阅读大量关于十月革命的报道。他不止一次地向他北京大学的同学表示：“只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11]邓中夏这里的言论，包含了中国要走“以俄为师”的道路、采取社会革命手段以变革中国社会的迫切愿望。其后，邓中夏积极响应李大钊的号召，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大钊所明示的“革命—现代化”路径，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谋求中国的现代化，就在于以现代化的手段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政治理想，是与政治实践、社会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政治目标。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其目的就在于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使中国能够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俄国十月革命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把马克思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这使得李大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鼓舞。他说：“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1]332}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革命是对既存旧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新社会秩序的建设，其实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李大钊对俄国革命所创立的新秩序表现出高度的欣赏，认为俄国革命对于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故而他说“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1]332}。李大钊高度评价俄罗斯自十月革命以后所建立的具有自由秩序、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文明，认为这个新文明乃是未来世界演进的最新潮流，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具有崭新的意义。应该说，李大钊将宣传十月革命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结合起来，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向主动性、民族性的方向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新文明建设亦有深刻的启示。

四、为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推动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推进，必须坚持“革命—现代化”路径，而十月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形式和庶民创造历史的力量，则引发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主体力量的集中思考。在唯物史观的认识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现代化所采取的乃是“革命—现代化”路径，这里的“革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社会革命”，而“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存在。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7]194}革命阶级本身是生产力的论断，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革命运动中的重要表达。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乃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也不例外。李大钊在对十月革命的研究与宣传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肯定，突出的表征就是认定十月革命乃是“庶民的胜利”。这是我们阐释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现代化意蕴时所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所具有的民彝思想，业已表明他对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高度重视。民国初年，李大钊在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中尤其重视“民彝”的作用，其所写文章《民彝与政治》力图将“民彝”与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认为政治的目标是建立能够彰显民彝精神的政治体系，从而使政治“能通民彝与国法之制”。李大钊依据中国传统的训诂方法，认为“彝”古有三训：一训器，器皿之器，是形而下的可见形态；二训常，即伦常，亦即心理趋向、道德

伦理等之类;三训法,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些习惯(即“不成文法”)。按照笔者的看法,李大钊对“彝”的训诂,虽然在于弄清楚“彝”的本义,但也在于弄清“彝”的比喻义和引申义,而更主要的乃是通过“对“彝”本义的诠释,来打通民彝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要“建立以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体制”^[12]。何以见得?因为在李大钊看来,“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且中国今后的历史全靠人民群众“本其清新纯醇之资能,以晶映其异采”^{[3]277}。这里的“民彝”乃是指老百姓的自然习性、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风尚等精神性因素,并认为这些精神性因素(即“民彝”)乃是创造历史的基本力量。这里虽指出民彝是创造历史的精神力量,但并未揭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力量,其唯心主义的色彩是很鲜明的。这说明,李大钊提出的民彝思想还存在历史的局限性,就是仅把“民彝”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中的精神力量,尚未看到“民彝”乃是一种物质力量,更未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李大钊提出的民彝思想,说明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性因素对于社会运行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将“民彝”与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人民群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存在的政治意义,这为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李大钊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从十月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他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是“庶民的胜利”,并专门写出《庶民的胜利》一文来说明十月革命中“庶民”所发挥的创造历史的作用。这里,李大钊是将“庶民”作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而呈现的,强调的是人民群众乃是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显然是他接受唯物史观之后才有的新观点。从李大钊早期思想演进历程来看,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高度赞扬群众运动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的意义,这是李大钊早期所提出的民彝创造历史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合理延伸。李大钊从历史变

动的具体事实研究中认识到,十月革命是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壮举,其最突出的表现是通过“群众的运动”形式为实现劳工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所以这样的群众运动才会具有“宗教的权威”,才会风靡20世纪的世界。同时,他还认识到劳工阶级才是掌握现代工业技术的主要群体,现代工业社会必然离不开劳工阶级,甚至在十月革命的进程中还出现了资产阶级“现在都来谄媚他们”^{[1]376}的现象。李大钊说,“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人人变成工人”这样的潮流“只能迎,不可拒的”^{[1]359}。此种情形也表明这样一个真理,即“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7]194}。李大钊的论述说明,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家占据的生产资料还给人民群众,从而建立人民群众的“新社会”。这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现代生产力实践主体的思想。可以说,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实现了由唯意志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不仅主张从社会存在本身去寻找社会历史的动因,而且明确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和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力量。

李大钊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后,就鲜明地主张并积极促成民众投入到“社会改造”的“革命—现代化”行动当中。社会革命需要广泛动员群众,社会现代化乃是群众的事业。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以往中国革命失败、社会变革运动受阻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而缺乏群众基础,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和社会主义的行进方向。基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来看,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作为推进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出来,故而人民群众与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李大钊在后来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6]20}正因为如此,李

大钊基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非常重视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社会革命,这实际上就是进行现代化的政治动员,同时也是进行社会革命的社会动员。因此,从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的视角,有助于认识和理解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现代化意蕴。

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将动员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根本手段,其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的意识特别强烈。他在《Bolshevism 的胜利》中转引了陀罗慈基的言论:“这革命的新纪元,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造成新组织体。这种新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在这枪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我们应先自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惟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将来似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于今日。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就是现在,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绊锁。”^{[1]366}从现代化动员来理解李大钊引用这段文字,至少有这样三点突出的思想:其一,俄国革命是“革命的新纪元”。李大钊以社会革命的眼光界定十月革命的性质而确立其开辟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指明中国社会变革的“以俄为师”的道路,亦即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来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在“新纪元”的时代语境之中推进中国社会的变迁。其二,继续“新纪元”必须“造成新组织体”。李大钊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他要求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无产庶民”为主体、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在中国造就新的组织体,并认为这种新组织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这里充分肯定这种新组织体在社会现代化事业中的地位,实际上乃是进行现代化的组织动员。其三,明确劳工阶级是社会前进中“惟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李大钊十分注重阶级意识的启蒙,认为阶级力量是在动员中崛起的,将来“有几千万人跃

起,束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并希望中国的劳工阶级具有战略定力,“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坚信劳工阶级乃是“惟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李大钊基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纪元”地位,又认定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路先锋”,同时突出“群众运动”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意义。他指出,在此以后,20世纪的全世界发生“人类普遍心理变动”而形成的“普遍心理”是以群众为本位的思想语境,于是“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并且正是群众所凝聚的“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创造了历史,其结果就是把“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而那些“历史上残余的东西”自然是无法阻挡人民革命的历史洪流,它们“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1]367}。对于李大钊所说的对“群众运动”要有正确的理解,就是既不能将“群众运动”的这种“政治运动”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也“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而应该将两者统一起来,并认识政治运动的社会运动意义,因为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7]195}。李大钊的论述说明,“群众运动”表现出人民创造历史的根本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力量的社会变革运动。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需要基于唯物史观从多个层面、多种视角加以阐发。本文仅从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含的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领导主体、“革命—现代化”路径、推动力量等几个要素,来考察和解读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历史活动,借以说明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业已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现代化意蕴。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十分关注中国社会现代化,曾就中国启动社会现代化的条件予以研究,认为铸造现代民族主义精神、发挥国家的组织职能、培植新的现代化力(下转第 75 页)

- 断执法的规则修正[J]. 当代法学, 2021, 35(4): 104 - 115.
- [10] 叶金育, 顾德瑞. 税收优惠的规范审查与实施评估: 以比例原则为分析工具[J]. 现代法学, 2013, 35(6): 171 - 183.
- [11] 张占江.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谦抑性[J]. 法学, 2019(3): 45 - 59.
- [12] 张占江. 个人信息保护的反垄断法视角[J]. 中外法学, 2022, 34(3): 683 - 704.
- [13] 张红. 行政罚款设定方式研究[J]. 中国法学, 2020(5): 84 - 105.
- [14] 徐向华, 郭清梅. 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 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J]. 法学研究, 2006(6): 89 - 101.
- [15] 蒋岩波. 反垄断没收违法所得处罚问题研究: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J]. 经济法论丛, 2017(1): 119 - 153.
- [16] 李世刚, 包丁裕睿. 大型数字平台规制的新方向: 特别化、前置化、动态化: 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解析[J]. 法学杂志, 2021, 42(9): 77 - 96.
- [17] 苏宇. 面向不确定性的行政裁量及其法律控制[J]. 经贸法律评论, 2020(4): 68 - 80.
- (责任编辑: 冯兆娜)

(上接第10页)量等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启动的必备条件^[13]。十月革命发生后, 李大钊更是对现代化问题给予了深刻探索; 而且他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 致力于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伟大的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等重大历史活动,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努力和贡献^{[9][14]}。

现代化是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进的历史性进程, 说到底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李大钊对此亦有比较系统的探索和理论上的建树, 提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的观点, 并主张在中国首先进行民主革命以完成解放生产力的任务, 继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15]。因此,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开创者, 同时亦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先驱。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 王韶兴.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6): 4 - 24.
- [3]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4] 吴汉全.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53.
- [5] 吴汉全. 早期李大钊政党政治观初探[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3): 5 - 10.
- [6]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78.
- [9] 吴汉全.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J]. 江海学刊, 2001(3): 142 - 147.
- [10] 毛泽东.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339 - 341.
- [11] 晓北, 姜伟. 邓中夏[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3.
- [12] 吴汉全. 中国传统文化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J].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4): 19 - 23.
- [13] 吴汉全. 早期李大钊对启动中国社会现代化条件的思考[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4): 14 - 20.
- [14] 吴汉全. 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化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1(Z1): 56 - 60.
- [15] 吴汉全. 论李大钊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J]. 河北学刊, 2001(3): 84 - 88.
- (责任编辑: 李秀荣)